

民族地区“一老一小”代际融合照护模式的田野实践与机制创新

——以贵州批林村为例

雍朝名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6日

摘要

在西南民族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人口空心化加剧的背景下,“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的照护需求相互叠加,形成了突出的民生服务短板。本文以文化濡化理论为分析框架,选取贵阳市花溪区高坡苗族乡批林村为田野个案,考察该村“善行贵州·益童乐园”项目七年来的代际融合照护实践。研究发现,益童乐园通过营造制度化濡化场域、重塑老人文化主体身份、引入专业“濡化中介者”,将断裂的家庭文化传承链条修复为社区公共空间中的代际互惠结构,从而在文化传承中实现了老幼双向赋能的融合照护。这一实践为民族地区以文化传承为纽带推动“一老一小”民生服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范式。

关键词

民族地区,“一老一小”,代际融合照护,文化濡化,益童乐园

Field Practice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ed Care Model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 Case Study of Pilin Village, Guizhou

Chaoming Y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il 28, 2026; accepted: August 18, 2026; published: August 26,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outflow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laborers and the intensifying population hollowing in southwester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superimposed care needs of the “left-behind elderly”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have created a prominent shortcoming in people’s livelihood services. Adopting the cultural enculturation theory as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takes Pilin Village in Gaopo Miao Township, Huaxi District, Guiyang City as a field case and examin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ed care practice under the “Shanxing Guizhou-Yitong Leyuan (Children’s Paradise)” project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The study finds that Yitong Leyuan, by creating an institutionalized enculturation field, reshaping the elderly’s identity as cultural subjects, and introducing professional “enculturation intermediaries”, has repaired the broken chain of family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ed it into an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al structure within the community public space. This has achieved integrated care featuring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of both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through cultural inheritance. This practice offers an experiential paradigm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livelihoo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with cultural inheritance as the bonding link.

Keywords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ed Care, Enculturation, Yitong Leyuan (Children’s Paradis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伴随少子老龄化加速与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西南民族地区“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同步增长，形成照护需求叠加的困境。贵州易地搬迁人口 192 万人，是全国搬迁规模最大、城镇化安置比例最高的省份，其中“一老一小”达 65 万人，占 33.9%¹。在此背景下，将托老与托幼服务相融合，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进代际互动和融合的“老幼共托”模式^[1]，被视为缓解家庭照护压力、优化民生资源配置的重要路径。从国家层面看，“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部署了“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的总体框架²。在此政策导向下，贵州省积极探索民族地区“一老一小”服务的地方路径。2025 年，贵州在全省 22 个万人以上的大型集中安置社区开展“一老一小”社会化服务保障试点，并将其作为易地搬迁示范社区创建的重要评价指标。同年围绕就业创业、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权益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相应措施，为安置社区民生服务提供制度保障。2026 年，“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能力”被列入贵州省十件民生实事³。这些政策信号表明，民族地区“一老一小”问题已从地方性困境上升为省级乃至国家层面的政策关切。

然而，政策关怀如何转化为嵌入民族文化肌理的有效实践，在村落层面仍有待民族学深入考察。本

¹https://mzt.guizhou.gov.cn/xwzx/mzyw/202512/t20251225_89087571.html

²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³https://www.gzrd.gov.cn/dbdhh/ygzdsjrmdbdhdshy_5996264/ybtgt/zfgzbg/202601/t20260127_89341191.html

文以贵阳市花溪区高坡苗族乡批林村为田野点，考察“善行贵州·益童乐园”项目七年实践。该村海拔1400米，留守儿童占比超85%，2018年益童乐园落地以来形成“益童乐园+芦笙传习馆+家长公益课堂”特色形态。本文追问：文化濡化在民族村落代际融合照护中如何呈现？其运作机制是什么？对民族地区“一老一小”服务有何启示？

1.2. 研究视角与方法

本文以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 J. Herskovits)提出的文化濡化概念，指代际间文化传承的过程，即个体通过家庭、社区等途径接受某种文化，从而型塑其文化“品格”的社会机制[2]。濡化最初开始于家庭，父母、祖父母等将本民族的语言、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晚辈。在民族地区传统社会中，濡化是维系民族文化连续性的核心机制[3]。

有必要在此明确区分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与涵化(acculturation)两个概念。在人类学学术史上，二者有着清晰的边界：濡化是指个体学习本群体文化的过程，即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涵化则是指不同文化群体持续直接接触后，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迁的现象。赫斯科维茨于1936年与雷德菲尔德、林顿合著《涵化研究备忘录》，将涵化定义为“由个体所组成的而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间发生持续的直接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迁的现象”[4]。简言之，濡化关乎文化纵向的代际传递，涵化关乎文化横向的接触变迁。本文使用濡化一词，聚焦的核心问题是：当家庭这一濡化的首要场域因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而系统性失能时，民族文化代际传承的通道如何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得以制度性修复。

然而，文化濡化理论在当代民族地区的适用面临一个新情境：传统濡化以家庭结构完整为前提，而批林村的实际情况恰恰是这一前提的瓦解。本文因此将分析视野从单一的家庭濡化场域拓展到家庭、社区、学校三个濡化场域之间的互动与张力。在传统苗族社会中，家庭是文化传承的第一课堂，它通过“家庭濡化”这一潜移默化的过程实现[5]。火塘边、芦笙场上、节庆仪式中的言传身教构成了弥散性的文化传承生态。学校作为现代性制度的代表，以汉语和国家统一课程为媒介，在客观上扮演着将民族文化传播推向边缘的角色[6]。社区则长期作为濡化的补充场域，依托宗族互助、邻里帮带等非正式网络发挥作用。当家庭濡化功能因青壮年外流而衰退、学校教育又无力兼顾民族文化传播时，社区公共空间便成为修复濡化机制的关键突破口。批林村益童乐园正是在家庭、亲族、学校三重机制均难以有效回应的空白地带，对失能家庭濡化功能的制度化修复与空间化重构。本文的分析将贯穿三个场域之间的消长与互动，揭示制度化濡化如何在社区空间中有机生长。

田野点批林村为苗族传统村落，拥有三项省级非遗。笔者于2025年5月至2026年2月分四次驻点逾90天，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益童乐园日常运营、芦笙队排练及传习馆教学，完成参与观察记录逾5万字。半结构访谈采用目的性与滚雪球抽样，深度访谈21人，涵盖四类行动者：项目运营者(专职社工等)、文化传承主体(芦笙省级非遗传承人等“银发教师”)、服务对象(小学至初中阶段的留守儿童及其隔代抚养人)以及社区相关者(村两委成员、高校志愿者领队等)。访谈围绕照护与文化学习、参与动机、代际关系影响、社区认知等维度展开，单次时长40~90分钟，均经知情同意后录音转录。资料分析依主题分析法，对转录文本与观察笔记进行编码，提炼“濡化空间”“身份重塑”“社工中介”“双向赋能”等核心主题并交叉比较。同时系统分析益童乐园项目档案、政府文件及媒体公开报道。

2. 批林村“一老一小”照护的田野图景

2.1. 断裂与失衡：传统照护体系的结构困境

批林村坐落于花溪区高坡苗族乡西南部，全村常住一千人左右，耕地715亩，村民世代农耕但因高

海拔喀斯特地貌种地只能“望天吃饭”。村中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村里 100 多名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对大多数家庭而言，祖辈承担起孙辈日常监护与生活照料的责任，而远在城市打工的父母只能通过电话或视频与孩子保持联系。

这种由劳动力外流催生的“照护真空”，使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家庭照护体系面临三重困境。第一，儿童照护空白化。放学后无人辅导与组织活动，陷入深度“看护真空”。祖辈年迈精力不济，一旦监控缺位，山高路险环境下留守儿童易发安全事故。与生理安全失护相伴的是更深层的心理健康危机——长期亲情分离导致留守儿童孤独、焦虑、自卑等心理问题普遍存在。第二，老人照护边缘化。留守老人既担农活与又担任隔代抚养责任，自身养老保障严重不足，生活起居、疾病就医缺乏照料。与此同时，儿女长期外出务工导致代际间日常性的情感交流断裂，精神孤独与情感空虚更成为普遍心理困境。第三，文化传承断裂化。批林村素有“芦笙之乡”美誉，2009 年，该村芦笙制作技艺被列入贵州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⁴，但能熟练制作者已不足 5 位。高坡芦笙词以口传代代相承，口传链条断裂后承载民族记忆的曲目无声消逝。芦笙传承的代际断层，不仅是技艺流失，更是民族文化的结构性危机。

2.2. 照护困局的深层透视

从文化濡化理论审视，批林村困境的深层症结在于文化濡化机制的系统性失能。传统苗族社会中，老幼互动不仅是照护行为，更是嵌合于生活世界的文化濡化实践——承载语言习得、技艺传授、价值塑造与认同建构多重功能。老人在家庭场域中的言传身教，使其超越一般照护者角色，成为民族文化再生产的“活态载体”与“意义传递者”。

青壮年大规模外流从根本上瓦解了濡化机制的社会基础。濡化的有效性依赖于代际间持续、日常、情境性的面对面互动——老人在生活场景中自然展示文化实践，儿童在参与模仿中潜移默化完成文化内化。当外出务工成为主导生计策略，家庭代际完整性被打破，隔代抚养虽维持物理共处，村寨的民族文化遗产却出现断层，青黄不接^[7]。问题悖论在于：老人与儿童同处一个屋檐下，照护关系形式存在，濡化内容却被深度弱化。造成这一悖论的原因是多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依赖口传心授、行为传承等方式延续，容易受到时间、空间以及传承者状态等因素的影响^[8]。而留守老人精力能力有限，仅能满足生存照护需求，无力承担系统文化濡化功能。学校教育以汉语和主流知识为媒介，客观上挤压了家庭场域中民族文化遗产的日常空间，儿童在校习得国家统一课程知识，回家接受碎片化隔代照护，民族文化遗产陷入“两头落空”窘境。

由此形成了家庭、社区、学校三个濡化场域同步衰落的困境。在传统苗族社会中，三者本是互补的濡化生态：家庭承担日常濡化核心功能，社区仪式与节庆提供周期性强化，学校与社区文化并行不悖。现代学校教育的确立打破了这一平衡，而社区濡化网络也随着青壮年整体性缺场大幅萎缩，宗族互助、邻里帮带等非正式照护网络难以为继。正是在三重机制均难以有效回应的空白地带，一种制度化的替代性方案成为结构性需求——批林村益童乐园应运而生。它不仅是对儿童课后照护的功能补充，更是对失能家庭濡化功能的制度化修复与空间化重构：以社区公共平台重建代际文化传递通道，与学校形成功能互补——学校承载国家知识体系传承，益童乐园承载民族文化代际濡化，二者在儿童的日常时间与认知空间中建立了新的分工与平衡。

3. 文化濡化视域下益童乐园的代际融合实践

3.1. 益童乐园的落地与生长

2018 年 7 月，贵州省慈善总会、字节跳动公益与深圳壹基金共同发起“善行贵州·益童乐园”项目。

⁴https://www.huaxi.gov.cn/zwgkqb/zdlygk_5804950/ggwhfw_5805060/202211/t20221130_77281320.html

同年 12 月，贵阳市聚爱公益中心筹措资金 7 万余元，批林村村委会无偿提供村舍，将其改造为集阅读室、舞蹈房、手工坊、户外操场于一体的儿童服务站，配备专职社工与兼职教师，多所高校志愿者寒暑假入村服务。

项目落地后迅速经历了一个深度的“在地化”过程。标准化站点框架在嵌入批林村后，被本土文化元素重新塑造。2019 年 3 月，站点成立省内首个“儿童志愿者服务委员会”，儿童自主选举会长、安全员与宣传员，将“上课不能迟到、不能偷吃东西”等规则写入规章并张贴于墙，实行自我管理 - 这不仅是日常纪律的约定，更是儿童主体性被制度性确认的标志性时刻。同年，站点同步组建“小小芦笙队”和“苗歌飞扬”社团，聘请老一辈芦笙传承人面对面授课，由此，芦笙这一村落文化核心符号开始进入益童乐园的制度化框架，原本以课业辅导与安全看护为主的项目形态，被悄然改造为文化传承与儿童照护并行的复合空间。五年来，“小小芦笙队”培训了 30 余名儿童，走出大山展演 20 余次，登上贵阳大剧院舞台。2024 年建立“高坡童笙·芦笙传习馆”，编写了首本芦笙学习读本，千年苗族芦笙首次被儿童转化为简谱。同年登上贵阳路边音乐会，2025 年在高坡非遗芦笙工坊揭牌仪式上表演芦笙群舞 - 从村寨仪式空间到都市公共舞台，这一系列展演已不仅是技艺输出，更是儿童文化身份在更大社会场域中的公开展示与确认。2025 年初，站点发起“写给自己的歌”活动，社工带领儿童共创歌曲《大山里的家》，该作品成为全省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推广主题曲。七年间，站点累计服务百余名留守儿童，全村未发生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案(事)件，升学人数逐年增长。

3.2. 芦笙传承：文化濡化的田野实践

从濡化理论审视，益童乐园的芦笙传承实践构成了典型的“制度化濡化”场域，其运作可以从四个维度加以剖析。

第一，濡化场域的再造与制度化。传统芦笙传承依托家庭火塘、节庆仪式等日常生活场景，老幼在弥散性、情境性的互动中自然完成技艺传递。青壮年大规模外流导致家庭濡化功能系统性衰退后，益童乐园将分散于各家各户的文化遗产功能聚合至社区公共空间，通过固定课时、明确教学目标和社工的组织协调，重建了代际之间面对面的文化传递通道。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制度化濡化”并非对传统生活濡化的替代，而是对家庭功能失灵后的适应性补充与修复。它所传承的也非博物馆式的僵化技艺 - 当儿童将芦笙带上都市舞台、将口传曲谱化为简谱读本时，传统便获得了进入当代语境的活性。

第二，传承主体的身份重塑与价值确认。芦笙非遗传承人及其子罗某贵、罗某开父子受聘为“银发教师”进入益童乐园授课，这一安排的意义远超技艺输出本身。在传统家庭濡化中，老人作为文化传递者的身份是自然赋予、不言自明的。劳动力外流导致家庭结构残缺后，这一身份逐渐隐退，老人的文化价值感随之削弱。益童乐园在社区公共空间中赋予其正式教学身份和公开称谓，使老人从“留守者”“被照护者”的角色中脱嵌，重新成为“文化输出者”与“意义生产者”。罗某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他“希望更多年轻人学习芦笙制作”。这种身份转换带来的尊严感与价值感，构成了老人持续参与代际互动的深层心理动力[9]。

第三，濡化内容的拓展与儿童能动性的激活。儿童在益童乐园不仅学习芦笙演奏，更参与读本编写、宣传片拍摄、舞台策划与执行。“高坡童笙·芦笙传习馆”将日常练习制度化，儿童在自主管理中逐步形成主体性认知与文化自觉。当“小小芦笙队”登上贵阳大剧院和路边音乐会的舞台，芦笙从封闭的村寨仪式空间走向开放的城市公共平台，儿童也从被动的文化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文化传播者。濡化的目标由此从技艺的机械复制跃升为文化自信的内化与公共表达能力的培养。

第四，濡化与照护的双向赋能机制。老人传授芦笙为儿童课后照护注入了文化内涵，儿童的学习热情与成长进步则反哺老人的精神世界 - 在见证儿童点滴进步的过程中，老人获得情感慰藉与生命意义的

确认。这种双向流动打破了传统照护“施予－接受”的单向模式，形成了基于文化传承的代际互惠结构。文化濡化由此成为代际融合照护的内生驱动力：老幼互动不再依赖外部的制度设计来维系，而是源自文化传统本身所蕴含的代际契合－老人有技艺可传，儿童有文化可学，照护在传承中自然发生，传承在照护中获得日常载体。

3.3. 社工的纽带角色：濡化中介者的诞生

传统苗族社会的文化濡化依托家庭与亲族网络中的血缘地缘关系，无需外部中介。当家庭濡化功能因劳动力外流而断裂，外部专业力量的嵌入便成为重启濡化机制的必要条件。批林村益童乐园的实践表明，专职社工与高校志愿者共同构成了“濡化中介者”这一新角色，以不同方式搭建起代际之间、村落与外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传递通道^[10]。

专职社工是濡化网络的常驻枢纽。益童乐园仅有一名专职社工万某琴，其此前的超市工作经历赋予她与不同群体打交道的在地经验，使她既能成为孩子们的“临时家长”，又能充当与村民日常沟通的桥梁。从民族学视角审视，她承担着三重中介功能：一是资源链接者，对接高校志愿者、公益音乐人、专业教师等外部力量，将城市教育资源引入苗寨。二是文化翻译者，在老人与儿童、村落与外界、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不同话语体系间的转译与协调。三是情感陪伴者，与儿童的长期深度交往使她成为孩子们除家人之外最亲近的成人。正如一位留守儿童在访谈中所说：“爷爷和奶奶不懂的东西，我就去找老师帮我，老师什么都知道”。值得注意的是，社工的核心能力并非专业知识，而是“跨界转译”与“深度在地化”的生活智慧－而这恰恰是“濡化中介者”区别于一般项目执行者的关键特质。其“在地化”过程本身，便是文化濡化机制重启与创新的重要条件。

高校志愿者则是濡化网络的流动节点。贵阳学院、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志愿者定期入村服务。贵州师范学院“童心绘梦志愿服务队”开展儿童剧、心理团辅、曼陀罗绘画等多元活动。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通过播音主持课程提升儿童语言表达能力。广州耀华国际学校中学生乐团与“小小芦笙队”同台举办“大山童音”音乐会，实现了深山芦笙与都市器乐的跨文化对话。志愿者以短期高频的流动介入，持续为濡化场域注入现代教育理念、艺术表达与科学知识等新元素，使文化濡化从单一的技艺传授拓展为复合型成长支持。专职社工的常驻陪伴与志愿者的流动补充，形成了“一纵一横”的互补结构－前者修补日常的信任与情感纽带，后者带来间歇性的外部刺激与文化新知－二者共同维系并不断拓展着濡化网络。

从濡化机制的整体变迁来看，“濡化中介者”这一角色的诞生，标志着民族地区文化传承机制的一次重要转型－从家庭内嵌的自然濡化，走向社区支持的制度化濡化。社工虽不直接教授芦笙，但她组织老艺人授课、安排教学时间、协调各方资源，为老幼之间的文化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情感支撑。在这个意义上，“濡化中介者”是制度化濡化得以运转的关键行动者：他们修复的不仅是断裂的代际文化传递链条，更是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民族村落文化再生产的结构性可能。

4. 文化濡化驱动代际融合照护的机制分析

4.1. 空间重构：从家庭场域到社区制度化的濡化转移

传统苗族社会的文化濡化以家庭火塘、节庆仪式等日常生活空间为载体，代际互动弥散于衣食住行的自然场景之中。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导致家庭濡化场域碎片化后，益童乐园将分散于各家各户的文化遗产功能聚合至社区公共空间，以制度化形式集中实现。改造后的村舍兼具阅读、舞蹈、手工、户外活动等多重功能，儿童每日放学归来脱口而出的“我们回来啦”，标志着这一物理空间已转化为承载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的“第二个家”。贵州推行的“一室多用、错时共享”策略^[1]在批林村体现为以儿

童照护为核心、兼容文化传承的社区公共空间实践，为民族村落濡化场域的制度化重构提供了可操作的地方样本。

4.2. 主体激活：老人文化身份的重塑与代际角色转换

益童乐园聘请芦笙传承人为“银发教师”，其实质是对老人作为文化再生产主体地位的重新确认与公开展示。在心理层面，老人从“留守者”“被照护者”的角色中脱嵌，重新获得文化价值感与被需要的意义体验。在关系层面，老幼之间建立了“文化传授者－继承者”的新型联结，超越了隔代抚养中单纯的功能性照护。芦笙非遗传承人“希望更多年轻人学习芦笙制作”的表述，及其子每周末返乡授艺的行为，均表明基于文化传承的代际互惠蕴含着超越功能整合的持久动力－老人输出文化资源，获得尊严感与意义确认。儿童习得技艺，反哺以活力与陪伴。这种双向赋能，构成了文化濡化驱动代际融合的核心心理机制。

但本文也需指出主体激活过程中的不对称性。“银发教师”的文化输出得到了制度性确认和仪式化表彰，其“被需要”的精神需求获得了部分满足；然而，老人的物质性照护需求－生活照料、就医陪护、养老保障－并未被纳入益童乐园的服务框架。换言之，项目在“老有所为”维度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老有所养”维度仍是空白。一位留守老人曾对笔者坦言：“教娃儿吹芦笙高兴是高兴，可自己的腰疼没人管。”这一质朴表述揭示了代际互惠中“精神赋能”与“物质缺位”之间的裂痕。真正的“老幼共融”，需要在文化与照护两个层面同时发力。

4.3. 中介衔接：专业力量介入下的濡化链条修复

家庭濡化功能衰退后，代际文化传递通道的重建依赖外部专业力量的系统性介入。专职社工与高校志愿者共同构成了“濡化中介者”这一新角色。专职社工以常驻枢纽的身份，承担资源链接、文化协调与情感陪伴三重职能，其核心能力在于“跨界转译”与“深度在地化”－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搭建理解之桥，使外部资源有机嵌入村落社会肌理。高校志愿者则以短期高频的流动介入，持续注入现代教育理念、艺术表达与科学知识等外部文化元素，使文化濡化从单一技艺传授拓展为复合型成长支持。二者形成“常驻＋流动”的互补结构，以制度化方式修复了断裂的代际传递链条。这一机制的出现，标志着民族地区文化传承从家庭内嵌的自然濡化向社区支持的制度化濡化的关键转型。但此处必须正视濡化中介链条的脆弱性：整个濡化网络高度依赖一名专职社工的个人投入与情感维系。当制度化机制建立在个体化奉献之上而非稳定的制度保障之上时，其可持续性便面临根本性挑战。

4.4. 网络拓展：多主体协同的濡化生态系统

批林村的文化濡化实践并未止步于站点内部的老幼互动，而是逐步拓展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开放生态系统。贵州省慈善总会、壹基金、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等公益组织提供资金保障与顶层设计，构成濡化网络的基础支撑层。多所高校以志愿服务形式注入专业资源－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通过新闻采写、影像记录与普通话培训，将芦笙传承纳入乡村文化振兴的叙事框架。花溪区检察院以“益童普法小课堂”将法治教育嵌入儿童成长支持体系。高坡非遗芦笙工坊的揭牌及儿童表演，则标志着濡化实践从社区内部走向非遗保护的公共平台。这种“公益主导、政府引导、高校助力、多方参与”的协同模式，构建了一个开放多维的濡化网络，有效弥补了单一主体在资源、能力与视野上的局限。但多层网络的运行同样面临协调成本高、各主体目标不尽一致的挑战。公益组织追求项目品牌效应与社会影响力，高校志愿者侧重实践育人功能，在地社区则期待持续稳定的日常服务－多元诉求之间的张力，需要在项目治理层面加以调适。

5. 结论

批林村益童乐园七年实践表明,以文化濡化为内生动力的代际融合照护,将断裂的家庭传承链修复为社区空间中的代际互惠结构,老幼在芦笙传承中双向赋能。理论上,本文拓展了濡化理论的当代适用边界:当家庭濡化因劳动力外流而断裂,社区空间可通过制度化方式承接,“濡化中介者”组织重建意义联结,濡化机制从“家庭内嵌”走向“社区制度化存续”。这一过程的核心是文化代际传递通道的制度修复。纳入家庭-社区-学校三场域互动,则呈现了制度化濡化与家庭功能互补、与学校教育分工的动态平衡。

该模式的成功依赖若干特定条件,构成其可推广性的边界:第一,文化资源的独特禀赋,芦笙作为高度符号化、可展演的文化资本,为代际互动提供了天然纽带以及可转化的社会价值^[11]。第二,“能人效应”的关键作用,专职社工万某琴长期深度在地投入所凝聚的信任资本具有不可复制性;第三,头部公益组织持续资助,提供了远超一般农村社区站点的资源支持;第四,传统村落的宗族网络与非遗传承人体系成为其独特的内生组织基础。忽视这些条件,模式复制极易失灵。与此同时,项目暴露的结构性制约同样不容回避:专业人力极度匮乏,仅一名专职社工支撑整个濡化网络。服务重心明显“重幼轻老”,老人作为文化输出者被激活,但其自身的养老与照护需求始终悬置。资金依赖项目制供给,一旦资助周期结束便面临断层风险。

据此,政策建议应聚焦于制度化构建而非个体依赖:第一,设立“文化传承人+社区照护”专项基金,以政府购买服务为“银发教师”提供课时补贴与养老补充,省级福彩公益金可率先在非资源富集村落试点;第二,将老幼共融服务纳入村规民约,通过村民议事会明确代际互助义务,增强服务内生性;第三,建立民族地区社工本土化培养体系,定向招录具备苗语能力和社区经验的本地社工,降低对“外来能人”的单一依赖;第四,探索从“老助幼”向“老幼双向照护”升级,将老人健康管理及精神陪伴嵌入社区服务平台。

批林村实践不是在传统断裂前的浪漫回望,而是在结构性困境中以文化为支点撬动社区韧性的复杂探索。其经验与局限,共同为民族地区“一老一小”服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

参考文献

- [1] 朱勤. “老幼共托”的本土化实践与可持续发展[J]. 人民论坛, 2025(4): 11-15.
- [2] [美]梅尔维尔·杰·赫斯科维茨. 人及其工作[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4.
- [3] 刘天, 叶蓓蓓. 文化共生视域下民族地区儿童文学课堂的构建——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J]. 民族教育研究, 2022, 33(3): 129-135.
- [4] 汪宁生. 文化人类学调查: 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47.
- [5] 陈世柏. 基于集体记忆的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机制[J]. 广西社会科学, 2026(1): 157-164.
- [6] 张蓉蓉. 教育与文化传承: 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两个问题[J]. 贵州民族研究, 2006(4): 157-160.
- [7] 曾瑜. 铜仁市民族特色村寨旅游业发展态势分析[J]. 贵州民族研究, 2021, 42(4): 166-172.
- [8] 杨晓辉, 罗微, 陈华文, 等. 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保护与传承利用: 体系、路径与挑战[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40(9): 2297-2315.
- [9] 武汉大学人口高质量发展课题组. 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战略思考——“十五五”时期人口战略的若干思考与建议[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5, 35(10): 1-11.
- [10] 张锋. 透析少数民族“文化中间人”的多维度内涵[J]. 贵州民族研究, 2015, 36(1): 123-126.
- [11] 张振鹏. 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理逻辑、实践路径与长效机制[J]. 民族艺术研究, 2026, 39(2): 1-11.